

罗长远 —— 著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 变化的趋势、成因和含义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系列作品

制度、结构与发展丛书 主编 陆铭 陈钊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长远 —— 著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 变化的趋势、成因和含义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系列作品

制度、结构与发展丛书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趋势、成因和含义/罗长远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制度、结构与发展丛书/陆铭,陈钊主编)

ISBN 978-7-5432-2386-8

I. ①中… II. ①罗… III. ①劳动报酬-研究-中国
IV. ①F24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6636 号

责任编辑 李 娜

装帧设计 储 平

制度、结构与发展丛书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趋势、成因和含义

罗长远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149,000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386-8/F·747

定价:32.00 元

总序：问题导向的经济学

在过去的七八年里，中国经济学界涌现出一批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青年经济学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关注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和制度环境，既没有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上，也没有生搬硬套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他们是中国经济学的希望所在。作为这批青年经济学家的代表，陆铭和陈钊两位发起主编《制度、结构与发展丛书》，并邀我作序，我欣然应允。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是从“发展组”走出来的青年经济学家。他们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让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半正式的研究小组。之后，他们进入体制内部的研究机构，从而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做针对性的研究工作。他们深入基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那时虽然没有理论，但却常有令人振奋的新发现；正因为如此，那时的经济学研究和政府政策结合得非常紧密，一些政策建议（如价格“双轨”制）直接成为政府政策。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学最令人兴奋的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学开始向学院化转变。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个学科要有积累和发展，就必须创立一套研究语言，现代经济学理论就是经济学的研究语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令人敬畏之处在

于：在一个关于人的行为的简单假设——即理性假设——之下，它构建了一套模拟理想市场运作的优美且内容丰富的逻辑体系，而且，它的多数预测都被经验研究所证实。这当然不是说现代经济学穷尽了对现实世界的描述；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作用不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详备的描述，而是为我们理解现实世界提供一个简化的模型，让我们在纷繁的现实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反映的是现实世界的局部常态，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片面才能深入，追求大而全反倒会流于肤浅。中国经济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走过的路，是引进和消化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主要高校纷纷开设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对学生的训练越来越规范；在研究方面，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模型和计量方法。

进入新世纪之后，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到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高校中已经形成了近十个归国学者集中的机构。归国学者的加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规范化，并把经济学论文发表的门槛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教育部到各主要经济学院系，对教师的考核纷纷提高了标准，教师要获得学术晋级，国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是基本要求，国外发表论文的权重大大增加。虽然一些院系的做法过于苛刻，但总体而言，考核标准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然而，任何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中国经济学在规范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其中之一是囫圇吞枣，即生搬硬套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这在一些年轻学者特别是博士生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是没有融会贯通地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要加强现代经济学的教育。但是，这不是简单地要求学生更多地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建模技巧，记住更多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帮助他们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之间建立起联系。我接触过很多中国留美博士生，考试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做论文才是最困难的。由于不容易获得中国的数据，而且美国的毕业生就业市场也不欣赏中国研究，绝大多数留学生不得不研究美国的问题。但是，他们对美国的了解有限，一些对于美国学生来说信手拈来的常识，对他们来说却是陌生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留学生只好选择做数理经济学或者计量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国内学生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即无法建立起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有些学生更是错误地认为理论模型可以用来证明

一个原理或规律。中国经济学要有更大的发展，非得让学生回归现实不可。

另一个值得担忧的趋势是，因为强调国外发表论文，一些学者特别是部分归国学者更多的是研究国外学术界感兴趣，但却不一定对我国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比如，一些学者以研究文献为起点，希望找到文献中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而不是到现实中去寻找问题。正如林毅夫教授常说的，他们是坐在中国这座金矿上寻找煤炭。归国学者不关注中国现实问题，那为什么要回国呢？

与此相关的一个趋势是，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相脱节。在经济学家当中，正逐渐形成学院经济学家和政策经济学家的分野，两部分人都相互瞧不起。一个社会里存在政策经济学家是正常的事情，政府和企业对他们的需求非常大；但是，学院经济学家不关心政策讨论却是不正常的。一些人可能会说，你看美国的经济学家都不关注政策。这是误解。除了少数经济学家（如罗伯特·卢卡斯）只关注学术而有意回避政策讨论之外，美国的知名经济学家都积极地介入政策讨论，那些表面上没有介入的，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而已。正是因为没有机会，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只是把经济学研究当作一种职业，而不是经世济民的手段，因而他们的研究往往与现实脱节，成为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中国处于一个伟大的转型阶段，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不介入现实，对不起这个伟大的时代。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愈发意识到本套丛书的作者以及他们倡导的研究风格的可贵之处。他们当中既有本土培养的学者，也有归国学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迷信文献，而是从现实中寻找问题，并上升到理论。丛书的名称定为“制度、结构与发展”，意在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放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研究。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增长奇迹并不成其为一个奇迹，因为中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都没有超出标准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议，如高储蓄、高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少管制、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民营化、保护产权等等。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这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却没有采纳？进一步，为什么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了超常的经济增长，而多数转型国家却陷入过长时期的倒退？

国内外的一些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成功源于中国的威权体制，但是，这个解释如果不是源于学术上的懒惰的话，也是有意而为之的曲解之论，无法经受现实的

检验:如果威权体制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那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应该成功了,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有人可能会说,威权体制+计划经济不成功,但威权体制+市场经济就可以成功。这个辩解本身就已经承认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对比改革开放前后30年,政治体制没有变,而经济制度改变了,因此,我们唯一的结论只能是,真正起作用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威权体制。

事实上,用威权与民主的两分法来概括中国的现行体制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它不仅遮蔽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丰富性,而且助长了学术上的懒惰之风:用威权或民主来套中国的制度和体制,然后开始推演,看似逻辑严密、道理精辟,实则是对他人理论的空洞无物的重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没有民族自信的表现。从任何方面来看,中国都正走在民主化的大道上。学者的任务是分析我们所走过的路,并指明未来道路的各种可能性。这要求学者对我国的体制进行深入和细致的分析,看哪些内容是起到正面作用的,哪些内容是应该摒弃或改变的。中国既然能够产生经济奇迹,中国的体制当中一定存在合理的成分,中国学者应该不怯于把它们展示给世界。

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中国所走过的路没有特殊性,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是世界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部分。这不是说中国所走过的路和其他国家一模一样。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但是,如果仅仅为此就认为中国是独特的,那所有国家都是独特的,宣示一个国家的独特性也就失去了意义。中国学者的任务是从中国的特殊性中找到具有世界意义的规律,并把它们展示给世界。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学者就要使用世界能够听懂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就是要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当下的制度和体制问题。

本套丛书的编者和作者都是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且对中国现实问题具有浓厚兴趣的青年学者,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者的影子。但是,他们的工作不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简单重复,套用过去常用的说法,是发生了“螺旋式的”上升;他们不再轻视理论,而是要从中国的现实中发掘理论。长江后浪推前浪,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篇章。

姚 洋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	001
第二节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一环:要素收入分配	004
第三节 本书的内容和结构	006
第二章 劳动收入占比的度量与决定:文献的视角	011
第一节 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与要素收入分配研究的复兴	011
第二节 劳动收入占比的定义与度量	012
第三节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理论探讨	014
第四节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实证研究	021
第五节 小结	025
第三章 全球化、民营化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026
第一节 关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特征事实:总量的视角	026
第二节 从文献看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已知和未知	027
第三节 实证模型、变量与数据	030
第四节 估计结果及分析	033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040
第六节	小结	044
第四章	产业结构演进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048
第一节	关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特征事实:产业和地区的视角	048
第二节	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度量	052
第三节	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分解	057
第四节	劳动收入占比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	060
第五节	小结	064
第五章	比较优势、要素流动性与劳动收入占比:针对中国工业行业的数值模拟	068
第一节	关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特征事实:工业行业的视角	068
第二节	现有文献的解释、共识与分歧	070
第三节	一个解读工业行业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框架	074
第四节	数值模拟	077
第五节	小结	086
第六章	融资约束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088
第一节	融资环境趋紧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在时间上的重叠:问题的引出	088
第二节	融资约束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理论假说	090
第三节	数据和变量	092
第四节	基准估计结果	093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101
第六节	小结	104

第七章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欧洲的经历及对中国的启示	107
第一节 欧洲经济困局中的劳动收入占比	107
第二节 一个基于生产函数的解释性框架	109
第三节 产业结构演进对欧洲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113
第四节 技术进步、不完全竞争和全球化对欧洲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115
第五节 小结及对中国的启示	122
 第八章 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发现与政策	 125
第一节 解读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结构主义”视角	125
第二节 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	128
 参考文献	 132
后记	145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依据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在 2011 年,中国的 GDP 达到 47.2 万亿元,人均 GDP 达到 3.52 万元。以 1978 年为基年,2011 年的 GDP 和人均 GDP 分别是 1978 年的 22.50 倍和 16.01 倍。从国际比较来看,在 1978 年,按 GDP 和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中国在 188 个国家中,分别排名第 10 位和第 175 位。而到了 2011 年,按 GDP 和人均国民收入排名,在 213 个国家中,中国分别排名第 2 位和第 114 位。在 1978—2011 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 10%(按不变价格计算,以上一年为基年)。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但中国依然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在 2008—2011 年期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2.82%,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9.64%。在“金砖五国”中,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速位居第一,排名第二的印度在这一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为 7.66%。从总量来看,中国已经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大个子”,从增速来看,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然而,与“亮丽”的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中国在其他方面累积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便是其中之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开始恶化。在 2003 年之后的 10 年里,国家统计局甚至不再公布基尼系数的数值。直到 2013 年 1 月 18 日,国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才重新透漏了这一时期的收入分配信息。依据他提供的数据,在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9,此后一路爬升至2008年的0.491。然后,基尼系数开始回落,但截至2012年,其值仍然高达0.474(人民网,2013年1月18日)。如果不考虑官方统计存在的缺陷,这足以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形势是严峻的。依据马建堂提供的数据,在国际上,2009年阿根廷的基尼系数为0.46、巴西是0.55、俄罗斯是0.40,2008年墨西哥的基尼系数是0.48,2005年印度的基尼系数是0.33。总的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印度和俄罗斯,与阿根廷和墨西哥大致相当,但低于巴西(人民网,2013年1月18日)。

尽管官方没有及时发布过去10年的基尼系数,学界却很早就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给予了关注。万广华等(2012)在一篇综述性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从经济改革之初开始下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就一直上升,在仅仅30年的时间内,收入差距上升了50%,中国从一个众所周知的收入平等社会变成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对于收入差距的拉大,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它与片面追求效率的政策倾向联系起来。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国家,在“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之下,中国很容易将“兼顾公平”的目标弃置一旁。然而,如果在发展的过程中,任由收入分配差距放大,“效率”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Wan等(2006)曾经识别和测量了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在短、中、长期内的相互作用,他们发现,不管时间跨度如何,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都是有害的。除了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之外,收入不平等还有以下的负面效应(万广华等,2012):一是,不平等程度上升会对社会凝聚力和政权稳定造成冲击;二是,不平等程度上升导致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更难改变他们的现状;三是,收入差距上升不利于减少贫困;四是,收入差距上升导致储蓄率升高,不利于扩大内需;五是,收入差距对内需的制约,加剧了贸易失衡,并引发贸易争端。

收入分配失衡也与中国经济面临的两个新的挑战直接相关,一个是“刘易斯拐点”,另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尽管这是两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但是它们对于中国经济的“警示”意义却值得重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简单地说,就是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如果企业要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在国内,以蔡昉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会到来,中国必须调

整现有的发展思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他们认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结束了人口红利,在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遇到困难时,日本政府通过补贴这些落后的本应该消亡的企业来干预宏观经济,从而留下了很多没有效率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使得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不能得到提高。中国要提早对劳动力市场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作好准备,避免走日本的老路(蔡昉,2010a,2010b,2011;Cai and Du,2011)。而以陆铭等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则认为,中国通过制度调整,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可以被释放和转移出来,“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陆铭和陈钊(2012)在一篇题为《当刘易斯遇到马克思》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加上城乡分割的政治经济学,才能理解城乡发展的相关现象。针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促进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如果将劳动力市场现状仅理解为数量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则可能促使政府进一步通过行政干预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扭曲资源在城乡和地区间的配置。不论两派观点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持何种见解,他们的分析均暗示了收入分配与“刘易斯拐点”存在联系。依据蔡昉等的观点,随着工资走上不可逆转的上升之路,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将很快发生重构。而依据陆铭等的观点,如果不对影响要素流动的一系列制度性因素进行改革,不仅“刘易斯拐点”有可能提早到来,而且还“堵死”了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通道。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来的概念,它源于这样一个经验观察,即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够跻身高收入国家,相反,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它们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那些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着一些共性,经济增速放缓和收入差距拉大便是其中比较醒目的特征。在当下,中国经济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如果没有进一步改革的红利,中国很可能步拉美国家的后尘而掉入“陷阱”之中(Cai,2012;胡永泰等,2012)。“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本书专门讨论的内容,我们在这里提及它,同样出于对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忧虑。如果这一状况不能通过改革得到校正,社会就可能陷入动荡,

发展共识就可能被“民粹式”的公平诉求所代替,从而错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机会。

第二节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一环:要素收入分配

在中国,人们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地区、城乡、行业 and 人际这四个维度。地区收入差距主要是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城乡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行业收入差距主要反映在垄断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之间,而人际收入差距则是诸多收入差距的集中体现。如果地区、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人际收入差距自然也会比较突出。在万广华等(2012)最近的文章中,有一组数据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地区、城乡和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2010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2倍,而上海市的人均收入是贵州省的5.8倍。除此之外,收入差距在省份的内部、在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同样存在。例如,城市家庭中最富有的20%居民,其收入占整个城市收入的42%,而最贫穷的20%只占总收入的6.5%……”。而对于行业收入差距,依据陈钊等(2010)的研究,在1988—2002年期间,行业因素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逐步放大,从1988年的1.03%上升至1995年的3.02%,再到2002年的10.07%。行业间工资差距之所以拉大,主要是由一些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引起的。

遗憾的是,在众多关注收入分配的视角中,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被忽略了(陆铭等,2008)。由于中国金融发展滞后,人们获取财产性收入的能力受到制约,经济增长的“红利”无法让全民及时地分享(陈斌开和陆铭,2013)。在这一背景之下,劳动收入成为绝大多数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整个经济中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将产生多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作为多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下降将放大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下降将不利于整个经济中消费能力的提升。

接下来,我们对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时间趋势作一个描述。在此之前,这里先对劳动收入占比作一个初步的界定(第二章将有更深入的讨论)。我们知道,从收入法角度,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四个部分,分别是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

折旧和营业盈余。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解释,它们的具体含义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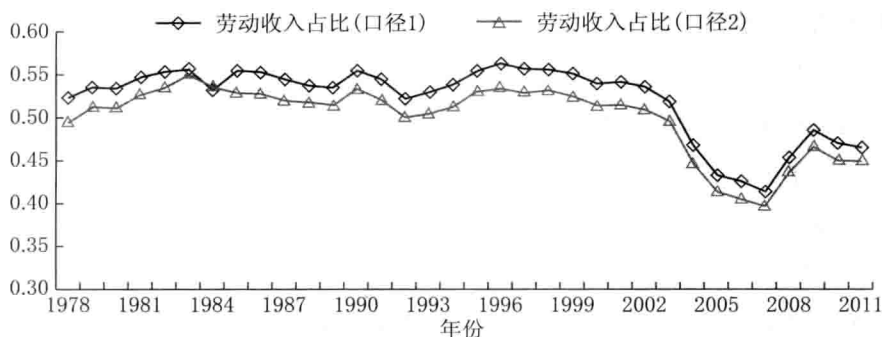
“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既包括货币形式的,也包括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

“生产税净额”是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余额。生产税指政府对生产单位从事生产、销售和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如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费和规费。生产补贴与生产税相反,指政府对生产单位的单方面转移支出,因此视为负生产税,包括政策亏损补贴、价格补贴等。

“固定资产折旧”是指一定时期内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或按国民经济核算统一规定的折旧率虚拟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它反映了固定资产在当期生产中的转移价值。各类企业 and 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实际计提的折旧费;不计提折旧的政府机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居民住房的固定资产折旧是按照统一规定的折旧率和固定资产原值计算的虚拟折旧。

“营业盈余”是指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

所谓的“劳动收入占比”,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指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结合 Hsueh 和 Li(1999)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我们计算了 1978—2011 年的中国劳动收入占比,见图 1.1。图中给出了两个口径的劳动收入占比:口径 1 是对各省的劳动收入占比简单地求平均;口径 2 则是对各省的劳动收入占比求加权平均,权重是各省的生产总值占全国 GDP 的比重。无论采取哪一种口径,可以明显看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劳动收入占比处在 50%—55%之间,较为稳定;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007 年期间,劳动收入占比则经历了一个稳步下降的过程。按口径 1 计算,在 1996 年左右,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曾经达到 56%的水平,而到了 2007 年,这一比重已经降到 41%的低位。



注：口径1指各省劳动收入占比的简单平均；口径2是各省劳动收入占比的加权平均，权重是各省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这里的全国GDP是各省GDP的加总。

资料来源：Hsueh和Li(1999)提供了1978—1995年间收入法口径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则提供了1996年以来的数据信息。

图1.1 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1978—2011年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利用外资和发展加工贸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长足发展，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劳动收入占比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趋于恶化。对这一现象的困惑，是写作本书最初的动机，特别地，我们想知道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背后反映了哪些因素的作用。为此，我们在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从地区、产业、工业行业和工业企业四个层面展开了深入的实证研究。除此之外，我们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关注了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问题，试图从其他国家的经历中找到可供中国借鉴的政策启示。从事这一研究工作，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考察要素收入分配，对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的文献是一个补充，现有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地区、城乡、行业 and 人际层面，而对于要素收入分配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其二，关注要素收入分配的走势，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和动力机制；其三，通过这一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优化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乃至整个收入分配格局提供智力支持。

第三节 本书的内容和结构

除本章导论之外，本书包括了七章内容。其中，第二章是文献梳理，第三章至

第六章是地区、产业、工业行业和工业企业四个层面的实证研究,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最后一章是总结。下面,我们对这些内容作简要的介绍:

一、劳动收入占比的度量与决定:现有文献怎么说

在正式考察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成因之前,我们先就要素收入分配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相关内容构成本书的第二章。这一章首先结合对自我雇用收入的处理,深入地讨论劳动收入占比的度量,接着,梳理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理论和实证文献。

二、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趋势和动力机制:中国的故事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从地区、产业、工业行业和工业企业四个层面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展开实证分析,相关内容构成本书的第三至六章。尽管这四章内容都是基于理论思考的实证研究,但它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三章侧重于考察全球化的影响;第四章聚焦在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上;第五章综合性地考察了比较优势变化、产业结构演进以及要素流动性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第六章则关注了融资环境对企业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1. 地区层面

我们首先依托 1987—2004 年中国大陆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成因,相关内容构成本书的第三章。通过对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我们发现 FDI、民营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通过这一章的研究,我们对于全球化因素在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深入的把握,对于中国要素收入分配走向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即 S-S 定理)相悖的原因也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

2. 产业层面

接下来,我们转向产业层面,把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分解为产业间效应和产业内效应,相关内容构成本书的第四章。通过这一章的内容,我们厘清了产业结构演进在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中的影响,为第三章有关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 U 形关系的结论找到了微观基础。